

现实道德观念的限制,这不仅削弱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还导致了他们在现实与网络世界中的道德感出现断裂。在“后真相”时代,宣泄欲望强烈的大学生在接受和解读信息的过程中,通常会受情感左右。此外,由于互联网的过滤功能,具有相似兴趣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这导致了大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交圈”,而这些“社交圈”在语言表达和价值观上都有所不同。大学生在面对群体的非理性言论和情绪宣泄时,往往为了与群体的观点保持一致而选择听从群体的建议,这种做法使得他们在道德判断上面临困难选择,同时也模糊了他们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价值观会逐渐偏向“社交圈”的价值观,导致了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上出现群体极化现象。

## (二)“盲从”倾向使大学生思想趋于固化

在“后真相”时代,互联网的惯用手法就是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概念的偷换,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认识进行扭曲,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进行精确运算,利用公众的主观臆断混淆并瓦解理性判断,从而扰乱社会的正向价值准则和道德秩序。一方面,在主观情绪和价值观的影响下,大学生更倾向于关注、喜欢和转发信息,并在算法的操纵下持续地接受同类信息,因此,他们对同质信息的依赖感和追逐程度越来越强烈,渐渐失去了对信息的掌控能力,最终由信息的制造者变成了信息的“奴隶”。另一方面,大学生要在互联网找到自己的圈子,在相同的圈子里,人们对信息的偏好、新闻的看法、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类似的消息就会持续地在人群中扩散,从而产生“回音壁”效应,而个人也会不断巩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以便更好地取得团体成员的认可,从而融入团体。

## (三)非理性的情感共鸣导致大学生心态失衡

“后真相”时代在社会表现上是一种较为复杂甚至扭曲的舆情环境,也就是一种介于事实和虚伪真相之间的、以煽动公众情感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大学生在获取大量信息后,往往容易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感立场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认知结构在信息整合与逻辑推演中可能发生转变,而其价值观亦可能在情感因素的作用下逐渐发生偏移。尤其在“后真相”事件引发的舆论环境中,这种现象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驱动型表达,这种情况有可能损害大学生的个人利益。因为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树立,所以他们对“后

真相”事件的看法具有很大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容易受到煽动,导致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下降,出现心理不平衡问题,容易被人利用而制造舆论冲突,这对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都是不利的。

## 三、“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叫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sup>[1]</sup>为确保网络意识形态的稳固防护,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积极的国内舆论氛围,高校要加快建设“后真相”时代下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建设不但要求高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求社会和学校切实履行好教育引导责任,还要求大学生重视自我教育。

### (一)强化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使思想政治工作联网上线,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2]</sup>。一方面,高校应坚守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高地,始终坚守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指导,严格守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网络的阵地,并高度重视网络对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深远影响。高校必须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只有真正加强党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全方位领导,并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得到落实,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环境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并确保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和颜色。另一方面,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高校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舆论导向中的正面影响,通过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其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思想误导和颠覆的能力。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全面领导,逐级加强责任,增强监督力度,并确保党性原则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得到体现,从而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高校舆情监控体系。在进行舆情的收集和处理时,相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舆情监控处理要求,始终维持高压态势。在确保舆论表达渠道的畅通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对学生群体的正常意见和有意制造的对立进行分类监管;在创建自由和开放的网络社交环境的同时,必须坚决制止高校的群体圈层化和群体极化现象,确保